



我国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效果研究

艾晶晶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 职业启蒙教育在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历程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在国家倡导与指引下,职业启蒙教育相关政策已在实践层面逐步展开。但从执行效果看,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定位不清、课程资源不足、实践形式不完善和师资队伍不健全等问题;从公共政策执行力模型分析框架来看,政策执行主体落实不力、客体各自为政、制度模糊不清,资源沟通不畅和环境不稳定等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职业启蒙教育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执行制度建设以实现“有制可循”;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以实现“有源可享”;加强宣传,营造落实职业启蒙教育的良好氛围。

关键词: 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力模型;政策执行效果

中图分类号: G473.8

DOI: 10.19504/j.cnki.issn1671-5365.2024.03.08

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变化性与不确定性使得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职业启蒙教育已成为新时期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国家政策的倡导与执行,我国基础教育已逐步探索出一定的实践成果^①。然而,从政策执行效果来看,当前我国职业启蒙教育在定位、形式

和资源等方面仍然存在现实问题^②,对问题及背后原因进行深入研究或有利于职业启蒙教育完成从局部尝试到全面普及的过渡,从而真正发挥职业启蒙教育在儿童未来生涯发展中的奠基作用。

一、我国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的问题表征

近年来,我国多项教育政策文件都强调要在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但由于职业启蒙教育在我国的实践基础相对薄弱,因此其政策在执行

收稿日期: 2023-05-15

作者简介: 艾晶晶(1999-),女,安徽芜湖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

层面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模糊与虚化:职业启蒙教育定位不清

职业启蒙教育是一个本土化概念,在其出现以前,学界较多使用的是“职业生涯教育”一词。而后,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实施,职业启蒙教育大多与劳动教育和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结合出现,成为二者的重要实践形式。概念的相伴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职业启蒙教育定位不清。职业启蒙教育与职业生涯教育的混用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职业启蒙教育独特价值定位,职业生涯教育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应该贯穿个体职业发展的全过程,但根据舒伯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论,职业启蒙教育重点在于启蒙,应该集中在成长期(0—14岁),故职业启蒙教育仅是职业生涯教育在儿童成长期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样,职业启蒙教育可以与劳动教育和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结合开展,互为对方的实践形式,但却并不能将职业启蒙教育隐含于二者之中,埋没职业启蒙教育促进儿童形成基本的职业认知,激发其职业理想,指导其职业生涯规划的独特价值。职业启蒙教育定位不清的问题在实践中体现为学校对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重视不足的问题。如当前许多中小学课堂未能完全重视职业启蒙教育,许多学校仍将它作为一种体验式课程、班会活动零散开展,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上海市中小学生职业启蒙教育与职业规划教育》项目研究小组的调查显示,59.2%的中学生表示学校没有开展过有关职业生涯指导或职业规划指导的教育^[1]。此外,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职业启蒙教育虽然也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础环节,但相比于职业准备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职业启蒙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程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而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二)多样与混乱:职业启蒙教育课程资源不足

职业启蒙课程即面向中小學生开展的、内容

上涵盖各类不同职业、形式多样的相关课程的综合,是一个完整体系。正如著名生涯理论学者舒伯所言,“生涯发展课程是促进学生发展的最适宜的方式”^{[2][3]},职业启蒙教育课程是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前,随着国家政策的倡导与各地的实践探索,我国职业启蒙教育课程资源呈现出多样化:一是普职联动共建的区域中小学职业体验课程资源,如北京市东城区从区域重点产业发展趋势和职业学校的专业资源出发,所设置的8大类别、361门具有专业特色的职业体验课程^[3];二是中小学自行开发的校本课程,如青岛市嘉定路小学自2011年开始自主开发的“嘉如世界”职业体验特色系列校本课程;三是当前社会上逐渐兴起的商业性职业体验场所也为职业启蒙教育提供了多样的课程资源,如“米薇城堡”“比如世界”等。尽管当前职业启蒙课程资源的呈现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但总体来看,当前各地的职业启蒙课程资源零散混乱,各类职业资源均具有各自的局限性。首先,当前职业启蒙教育并没有专门规定的国家课程,仍然依托劳动技术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来实施^[4]。其次,校内自主设计的校本课程资源往往是“一校一案”,大多由不同学科教师兼任开发,因而不具推广意义。此外,职业启蒙课程资源内容也十分局限,相关调研表明,目前中职学校开发的职业启蒙教育课程资源中有超九成的项目仍为职业体验类课程,其中涉及职业认知课程不足30%,有超过50%的中职学校缺少长期的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建设规划,缺乏相关师资的培养培训和可用资源^[5]。而社会建设的课程资源往往以参观、讲解的方式进行,课程内容大多为简单的职业介绍和职业体验,学生大多只是间接体验,深刻性欠缺。因此,从课程资源总体部署来看,尽管课程资源的种类丰富,但“可用、可推广、适用、好用”的课程资源仍然不足。

(三)分散与差异:职业启蒙教育实践形式不完善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虽然提出鼓励中职学校参与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却没有对具体参与形式作出规定。但是,在近年来的实践探索历程中,我国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启蒙教育实践形式,包括课程渗透、实践活动、平台搭建和实训中心建设。课程渗透即通过专门课程或学科课程渗透职业要素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是职业启蒙教育最为普遍的实践形式。实践活动以职业教育活动周和职业教育体验日为主要形式,如上海市通过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鼓励职业院校开放实训中心供中小学展开职业体验活动,让全市中小学生走进职业学校中亲身体验职业项目,从而了解项目背后的职业及其文化^[6]。平台搭建最具代表性的为北京市东城区教委搭建的职业体验营活动,该体验营联合了100多家单位设置多种体验活动,学生可通过在网上预约,深入企业内部体验不同职业岗位,在体验中学习相关知识,培养职业态度和情感。此外,实训中心建设也逐渐在中小学职业体验教育中发挥作用,据相关统计显示,上海市2016年共有65所职业学校和93个市级开放实训中心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放,共提供了17个专业大类322个职业体验项目^[7]。尽管当前已经形成了一定职业启蒙教育实践模式,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职业启蒙教育实践形式分散,不同地区之间的实践形式存在较大差异。例如,课程渗透虽然是最主要的职业启蒙教育实践形式,但当前尚未出现专门化的职业启蒙教育科目,学科渗透的具体要求与指导不明确。而实践活动、平台搭建与实训中心建设这类需要多元主体参与的活动持续的时间、频次以及面向的对象均有限,各地差异也较大,北上广深等教育相对发达的城市实践形式更为先进和完善,而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

(四)紧缺与非专业化:职业启蒙教育师资队伍不健全

师资是推动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当前职业启蒙教育师资队伍不健全是制约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发挥教育价值的关键问题。师资队伍不健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师资队伍结构和师资质量两个方面。首先,在队伍结构方面,目前各小学职业体验教育的师资队伍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校内教师,主要是班主任、大队辅导员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授课教师,在大多学校这些教师往往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二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行业模范等,在特定的职业体验活动中担任讲解和指导等工作,此类群体不固定,能够为学生提供专业的职业领域工作介绍与示范。两类指导教师分别构成小学职业体验教育校内课程与校外活动的指导主体,但二者均有角色局限性,即校内教师缺乏不同职业领域的专业性,而专业人员则缺乏针对小学生的教育引导能力。其次,在师资质量方面,校内指导教师大多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从教师对自身胜任力认识情况看,现下校内教师缺乏职业启蒙方面的相关知识与能力,因而无法在学生体验过程中给予合适的指导与评价,从而使得职业启蒙教育效果大打折扣。而校外的专业人员大多由学生家长担任,虽然可能从专业的角度介绍不同的职业类型,但是由于与学生接触时间较短,难以为学生提供持续性或追加性的指导与反馈,故难以充分发挥职业体验的效果。

二、我国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问题的归因

在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力是关键因素。基于公共政策执行力模型,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问题可从政策执行的主体、客体、制度、资源及环境方面进行归因分析。

(一)政策执行主体落实不力

政策执行主体即指执行政策的机构和人

员^[8]。在我国,中央制定的政策一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路径执行的,即上层(中央机构)制定或规划的政策被具体化为各种指示,由下层(地方机构)负责执行^[9],因此地方政府是职业启蒙教育政策的执行主体。对于职业启蒙教育而言,政策执行主体落实不力是导致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的政策精神经过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和不同政府部门过滤之后,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政策走形、扭曲现象^[8],即出现了政策执行偏差,具体表现为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和象征性执行三种情况。

替换性执行是指出现曲解式替换政策内涵,背离了原政策精神,偏离了政策制定的初衷^[9]。职业启蒙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启蒙儿童,帮助其获得对职业世界的初步认识,为职业生涯规划奠定基础。然而,由于对职业启蒙教育的内涵把握不准,部分地方政策出现了以职业宣传代替职业启蒙,以零散的参观、体验、宣讲活动代替职业启蒙教育的倾向,最终导致“重职业、轻启蒙”的替换性执行偏差。

选择性执行即在执行原政策时只有部分内容被贯彻落实,其余内容则被选择性消减,致使原政策内容出现结构性缺损。当前在实施职业启蒙教育过程中,由于诸多条件与现实情况的限制,各地往往会选择小学阶段开展,而相对忽视中学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导致职业启蒙教育被限制在部分群体之中,出现了选择性执行偏差。

象征性执行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用仪式性、表现性活动代替办实事、求实效的问题^[10]。《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应鼓励中等职业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11]。实际上,当前中等职业学校大多通过职业教育活动周、开放实训中心参观体验等形式零散地参与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而中小学校的职业启蒙教育也未能长期有效利用职业院校资源,双方之间以短暂的表面合作代替了长期深度合作

作,出现了象征性执行的问题。

综上,政策主体的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导致当前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定位模糊,在执行中因缺乏统筹而出现零散化、表面化和孤立化的实施问题。

(二)政策执行客体各自为政

政策执行客体是指政策的目标群体和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同度和支持度是制约政策执行的关键性因素^[8]。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在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校内校外两种资源加强职业启蒙教育,抓好综合实践基地建设,依托社会力量和各行各业的专业力量建设学生劳动实践基地^[12]。因此对于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而言,学校、社会、家庭均是职业启蒙教育的政策执行客体。然而,从当前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家、校、社三方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教育合力,而是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状态。

学校包括中小学校和职业院校,是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实施的主阵地。然而当前双方都没有深刻认识到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意蕴:一方面,中小学大多仅将职业体验活动等等同于职业启蒙教育,将职业启蒙教育隐含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或是劳动教育中实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职业启蒙教育对于帮助学生提升生涯规划能力,促进多元发展上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职业院校仅将支持职业启蒙教育当作是扩大职业教育影响力、彰显职教价值的主要手段,职业院校支持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形式大多以参加职业体验日,开放实训基地为主,尽管部分职业院校会开发一定的职业启蒙课程与活动,但总体而言,尚未形成校校深度合作开展教育的常态。

家庭本应是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参与方,但发挥作用甚微。英美等职业生涯教育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均会将家庭视为儿童职业启蒙的重要一方,如美国许多小学会邀请家长参加“职业日”活动或是组织学生走进家长们的实际工作场所;日

本的家长也会有意识地向孩子讲解职业相关知识,帮助孩子初步接触职业世界^{[13]75-86}。然而,当前我国家长对孩子极早进行职业启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2018年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四、八年级家长对子女情况关注程度的递减顺序依次是学习情况、身体健康、人身安全、道德品质、日常行为习惯、兴趣爱好或特长、心理状况^[14],对于子女潜在的兴趣爱好和职业发展可能的关注度偏低的现象表明家长在总体上还缺乏对于职业引导的意识。

社会力量作为职业启蒙教育重要补充力量也尚未被充分利用。当前,社会上已然出现了一些职业启蒙教育的商业资源,如各类儿童职业体验中心、职业体验夏令营项目等,然而当前社会上的职业体验资源多以商业模式发展,个别学校偶尔会与之合作开展职业体验活动,但尚未形成协同发展机制。

综上,学校、家庭和社会作为职业启蒙教育政策实施的客体,由于对职业启蒙教育价值认识的不充分导致家校社之间的合作往往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效率较低。

(三)政策执行制度模糊不清

制度是一套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体系,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制度就是政策执行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规则,包括政策执行的体制和机制^[8]。纵观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的职业启蒙教育长期处于一种自发、偶然和零散的状态。上海市是最早探索职业启蒙教育的城市,2005年,上海市闸北区(现静安区)人民政府发布的《闸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职业启蒙教育”一词^[15],这是“职业启蒙教育”首次出现在我国地方正式的政策文件中。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第一次以“五年规划”的形式强调“职业启蒙教育”,将其将职业启蒙教育推到国家高度。近年来,我国有关政策逐渐渗透了对职业启蒙教

育的强调,但从政策执行制度角度来看,当前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制度存在中央制度界定不清和地方实施办法模糊缺失两方面问题。

从中央政策制度来看,“十三五”规划发布后,2017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将“职业体验”新增为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活动方式,为职业启蒙教育的活动形式作出指导。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应鼓励中等职业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为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参与主体与发展途径做出了指导。2021年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普通中小学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开展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与劳动技术教育,并组织 and 引导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和行业组织等为其提供条件和支持”,更是为职业启蒙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综合来看,尽管多项国家政策法规中对职业启蒙教育均有所提及,但均篇幅有限,且职业启蒙教育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劳动教育等教育政策话语结合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职业启蒙教育政策制度界定不清的问题。

从地方层面来看,职业启蒙教育的落实需要各地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但综合各地情况来看,尽管当前已有多地在实践层面开展了一定程度的职业启蒙教育,如上海、江苏、吉林、河南、甘肃、河北、湖南等省都先后通过职业教育活动周开展职业体验活动,但当前各地却未形成专门的职业启蒙教育实施办法,仅有吉林省于2022年8月提出要制定《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学习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的指导意见》,促进职普融通、强化协作衔接,建立中(高)职学校与中小学校联合劳动育人机制^[16],也只是处于规划设想阶段,尚未出台具体文件。

综上所述,当前有关职业启蒙教育的政策均为方向性的政策引导,从中央到地方尚未形成系统稳定的职业启蒙教育实施制度,从而导致当前职业启蒙教育的相关资源、实践形式均呈现零散化和分散化的问题。

(四)政策执行资源沟通不畅

资源是政策执行的必要条件,政策执行能力有赖于所能获取的有效资源^[8]。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有赖于丰富资源的保障。从资源要素来看,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所需要的资源包括场地、平台、设备、课程、师资等内容;从资源结构来看,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资源可以分为校内资源、家庭资源、专业资源和社会资源。当前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在资源层面存在资源沟通不畅的问题,即学校资源与家庭资源、专业资源和社会资源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沟通与利用。

家庭资源主要指依靠学生家长提供的职业启蒙资源,是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重要的资源来源。家校资源的联合主要表现为学校利用学生家长职业的多元性,以邀请家长进校园介绍职业,或是通过组织学生走进家长工作场所参观的形式组织职业启蒙教育,如青岛市新昌路小学就以家校合作为契机,定期邀请各行各业的家长进校园为学生开展职业规划讲座。但当前家校资源的联合较为松散,且不确定性较强,各地、各校甚至是各班之间的开展情况差异较大,家长在职业启蒙方面的专业性有限,因此家校资源之间难以形成稳定联合。

专业资源主要指职业院校所能提供的课程、平台及培训资源,专业资源的丰富性、专业性和多元性特点使其成为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最为主要的资源。当前我国众多相关政策也都提到了职业院校要为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提供支持帮助。尽管专业资源存在显著优势,但是当前学校资源与专业资源的沟通形式却较为单一,主要以职业院校提供课程、开放场地、设计职业体验项目

等形式为主,且学校与专业资源的沟通大多为单向度输出,因此校校之间难以形成深度联合。

社会资源主要指社会上一些专门的教育性的体验场所,如图书馆、博物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还包括学校所在社区内的图书馆、派出所、养老院等,中小学也经常利用这些社会资源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然而当前社会资源的开发与供给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教育行政部门层面都没有相关政策、法规、制度的扶植。对于学校而言,如果想要进行职业实践体验活动,只能凭靠私人关系去开发社会资源,以满足学生学习需求^[17]。这种人情式的资源联合模式耗时耗力,且效果参差不齐,因此校社资源之间难以形成长期联合。

综上所述,当前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资源虽然较为多元,但是学校与各类资源之间的联合却存在松散、浅显和短效的问题,难以充分发挥各类资源的价值。

(五)政策执行环境不稳定

对于职业启蒙教育而言,政策执行环境主要包含职业启蒙教育开展过程中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基础等要素。

从社会氛围来看,我国整体对于职业启蒙教育的理念认识不够清晰,大多数人对职业启蒙教育价值缺乏认识。一方面,职业启蒙教育属于生涯教育的基础部分,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生涯教育起步较晚,生涯教育的基础本就薄弱,且当前生涯教育大多集中于即将面临专业选择的高中阶段教育,职业启蒙教育作为生涯教育的初始环节,主要面向中小學生,由于中小學生当前暂时不需要进行专业选择,因而难以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关注和重视。

从文化基础来看,职业启蒙教育在我国虽然是一个新兴概念,但有关职业启蒙教育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由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提出来的,涵盖整个职业生涯和全部教育过程的职业思想体系,其中,他所主张的小学职业陶冶就与

职业启蒙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统包统分”的计划性就业政策在预防失业、稳定民心、巩固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体职业指导的作用不断减弱,职业启蒙教育活动主要以劳动教育的形式推进^[19]。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学习越来越被重视,应试教育和升学竞争被不断强化,出现了普通教育与生产劳动脱节的情况,“职业元素”和相应的“职业指导”理念在普通教育中不断弱化。新世纪初期,随着职业世界的变化加剧,职业指导才以职业启蒙教育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公共视野之中。纵观我国职业启蒙教育相关思想的发展历程可知,自1949年以来,我国有数十年的时间处于统包分配工作的阶段,加之后期应试教育的强化,所谓职业指导和生涯规划一度消失在我国教育发展活动之中,最终导致我国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文化基础薄弱,不利于为当下职业启蒙教育的发展提供浓厚稳定的政策实施环境。

综上所述,社会意识与文化基础的淡薄加剧了当前政策环境的不稳定性,不利于职业启蒙教育政策的落实。

三、新时代我国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从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力的结构来看,政策执行的主体和客体是相互作用的,前者可以通过政策执行制度作用于后者,而后者也会通过政策执行制度对前者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因此,本文拟将政策执行主体、客体与政策执行制度综合考量,从制度、资源和环境三个方面对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提出建议。

(一)完善执行制度建设以实现“有规可循”

职业启蒙教育作为生涯教育的基础部分,不仅与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课程与劳动教育有重合部分,同时也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础环节,对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而言均具有重要意

义。由于职业启蒙教育政策的实施需要从中央规划过渡到地方具体落实,同时也涉及各地政府、中小学、职业院校、家庭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执行,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制度建设。首先,从中央层面丰富对于职业启蒙教育实施的相关政策指导,一是明确职业启蒙教育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劳动教育之间的关系,突出强调职业启蒙在个人生涯发展与普职教育发展中的独特价值,防止定位不清;二是明确不同主体的权责,尤其是中小学和职业院校在职业启蒙教育实施中的权责,保证多元主体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价值。其次,地方政府需要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结合地方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各地职业启蒙教育落实细则,细化实施办法,明确不同主体的权责和任务,帮助学校在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时有制可依。再次,完善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针对主体的不同分别制定职业院校参与成效考核评价机制、中小学实施成效考核评价机制和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完善相应的评价指标及标准,促使各职业院校、各小学以及各教师在评价中有度可依,真正的发挥评价的反馈和激励作用。最后,政府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强制性或鼓励性的形式规范中小学与职业院校和社会资源的合作,促使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顺利开展,为职业启蒙教育的落实提供法律保障。

(二)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以实现“有源可享”

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需要以各类教育资源为依托,当前,来自中小学校、职业院校、家庭和社会的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多样,但各类资源之间难以形成长期有效互动,因此,建立资源共享平台统筹多方可用资源,使得中小学在实施职业启蒙教育过程中做到有物可用。首先,搭建职业启蒙教育实践平台,职业启蒙教育的实践形式较为多元,但无论是专门课程的实施,还是学科课程的渗透,抑或是综合实践活动中职业体验活动的开展,都需要一定的实践场所作为支撑^{[13][109]}。中小学校场所

有限,课堂和校园的局限性并不能保证上述活动的有效实施,因此需要建立一定的实践平台,利用职业院校实训基地和社会教育资源优势,建立相对固定的职业启蒙教育实践基地,实现场所资源共享。其次,建设一定的课程资源库以保障职业启蒙教育常态化发展。中小学与职业院校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开发相关课程,职业院校负责提供多元且专业的职业认知课程,而小学则要把握住小学阶段学生认知特点,将专业的职业知识与促进学生自我认知的目的相结合,只有各小学与职业院校共同参与建设职业体验课程资源,才能实现职业体验教育课程化,促进小学职业体验教育可持续发展。最后,盘活教师资源,建设教师培训资源库。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小学职业体验教育充分发挥育人价值的前提和保障。目前小学职业体验教育的师资结构失衡,质量参差不齐,因此职业院校应发挥自身优势与各小学共育职业体验教育的师资,为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提供丰富的教师资源。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职业启蒙教育政策的落实需要稳定的政策实施环境,现阶段,我国整体对于职业启蒙教育的理念还不是很清晰,大多数人对职业启蒙的理念缺乏认识,职业启蒙教育的接受度并不高,因此需要大力加强宣传活动,营造落实职业启蒙教育的氛围。首先,继续发挥职业教育活动周的宣传作用,通过开放职业院校实训中心,设置多样化的职业体验项目等提升家长与师生对职业启蒙教育的了解。其次,通过研究机构促进现有实践成果的转化,当前各地所形成的案例虽然模式多样,但大多具有局限性,各类实践模式之间的交流受限,并没有形成良好的案例交流与分享机制,因此需要研究机构促进现有实践成果的转化,将各区、各校的特色案例加以转化与升华,从而形成能够迁移运用的一般经验,为其他学校参与职业体验教育提供示范与借鉴,提升各地中小学对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认同感。最后,发挥相关媒体的宣传展示作用,向社会宣传职业启蒙教育理念,提升社会对于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认同度。

注释:

- ① 杨静娟基于江苏省常州市实验小学自2001年起常态实施的学校劳动教育实践经验,总结了其中比较易于推广辐射的小学生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模式,参见杨静娟《小学生职业启蒙教育的七种模式》,载于《人民教育》2021年23期,62-64页。陈鹏等学者对当前中小学实施的典型模式进行了介绍,包括华西实验学校的“开心小农场”扬州育才实验学校的“科学试验田”、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的“校园区角”等,详见陈鹏《职业启蒙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之根》,《中国教育报》2015年6月25日报道。
- ② 吉标等学者基于交叠影响视域理论,从家校社三主体对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困境进行了分析,参见吉标、杨旭《交叠影响域理论视野下职业启蒙教育实施困境及突破》,载于《教育与职业》2023年4期,102-108页;邵文琪等学者基于共生理论对职业启蒙教育资源整合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参见邵文琪、王刚、刘晓《共生理论视角下职业启蒙教育资源整合的困境与突破》,载于《教育与职业》2021年7期,5-11页。

参考文献:

- [1] 刘华,马丽群.中小学生职业启蒙与职业规划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上海样本[J].中国德育,2012,7(1):17-20.
- [2] 沈之菲.生涯心理辅导[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 [3] 姜婷,徐昌,张志鹏.普职联动共建区域中小学职业体验课程[J].中小学管理,2019(3):46-48.
- [4] 田静,石伟平.从摇篮到生涯:类型化改革背景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之思考[J].职教论坛,2021,37(1):6-12.
- [5] 陆宇正.从孤岛到协同:“双减”背景下职业启蒙教育的破立与转向[J].职业技术教育,2022,43(19):40-47.
- [6] 周维红,刘慧,陈旭.体验学习视角下上海市学生职业体验日的经验及启示[J].当代职业教育,2016(12):72-75.

- [7] 高瑜,王振.中小学职业体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J].职业教育研究,2019(12):11-15.
- [8] 王学杰.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结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8(7):62-65.
- [9] 黄蓝紫.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政策的执行偏差与对策[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85-90.
- [10] 孙发锋.象征性政策执行:表现、根源及治理策略[J].中州学刊,2020(12):15-20.
- [11]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9-02-13)[2023-05-11].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 [12] 推进立德树人人的生动实践:2019年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观察[EB/OL].(2019-12-25)[2023-05-11].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912/t20191225_413424.html.
- [13] 陈鹏,等.职业启蒙教育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
- [14] 《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权威发布[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8(30):79-81.
- [15] 上海市闸北区(现静安区)人民政府.闸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2005-11-29)[2023-05-11].<https://www.jingan.gov.cn/xxgk/002013/002013019/002013019006/20060101/d4d2d703-cfc4-4318-868d-22e3eeb53e04.html>.
- [16] 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以“五个强化”扎实推进大中小学劳动教育[EB/OL].(2022-08-25)[2023-05-11].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192/s222/moe_1738/202208/t20220825_655201.html.
- [17] 张婷,张瀛.小学职业启蒙教育资源保障机制的窘境与对策:对X小学50名教师的访谈之思[J].现代中小学教育,2022,38(8):1-7.
- [18] 赵蒙成,王鲁艺.职业启蒙教育研究的历史追溯与策略建议[J].教育与职业,2018(13):26-32.
- [19] 吴楠,孙芳芳,高绣叶.建党百年我国职业启蒙教育的历史演进与现代启示:基于“家族相似性”理论视角[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6):67-72,83.

【责任编辑:王露】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eer Initiation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AI Jingj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changeability and uncertainty of individual career development highlight the value of career initiation education. At present, career initiation educ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launched at the practical level under the advocacy and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e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career initiation education has resulted in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positioning, insufficient curriculum resources, imperfect practice forms, and inadequate teacher teams. From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del, poor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subjects, fragment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objects, the ambiguit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system, poor communic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resources, and unstabl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system, build a platform for resource sharing,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promotion.

Keywords: career initiatio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del; structural analysis